

王向远 著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向远 著

中
日
文
学
化
研
究
文
库

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王向远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9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325 - 4722 - 7

I. 中... II. 王... III. 文学史—研究—日本 IV. I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1122 号

国家社科研究基金“十五”规划项目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

王向远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5 字数 359,000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300

ISBN 978 - 7 - 5325 - 4722 - 7

I · 1954 定价: 4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中日文化研究文库

主 编

王 勇

学术委员会

主 任：严绍璦

委 员：王 勇 王宝平 王金林 汤重南

黄俊杰 江 静 韦立新 郭万平

运营委员会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98号(邮编：310012)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TEL: (0571)88071024 - 6011

E-mail: tee_sai@yahoo.com.cn

联系人：郑洁西、董 科

总 序

王 勇

展呈在您面前的这本著作,是“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种。这套文库诞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每部著作都凝聚着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同时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期盼在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些著作会给您带来知识的愉悦和人生的启迪,希望您长久地喜欢她、呵护她。

中日两国的交往,就正史而言,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长期以来,日本以汉字为媒介,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华文明,由此积淀而形成自己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构成日本传统文化之基调,直至今天依然生生不息。如此持续而密切的中日文化关系,涉及到人文社科领域的方方面面,虽然前人对此进行过辛勤的耕耘,然而还有大片处女地有待开垦。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批根基扎实、视野开阔的学者,尤其在中日关系史领域,整体上已处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公诸于世,是本套文库的宗旨。

日本文化的生成变迁,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因素。就

外部原因而言,除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还涉及到朝鲜、西域乃至欧美诸国。事实上,7世纪以前,日本主要通过朝鲜半岛摄取中国文化,整个东亚构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文明环流圈;16世纪以后,先是葡萄牙、荷兰等,继而美国、英国等自西徂东,将日本卷入东西文明交汇的漩涡之中。有鉴于此,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及东西文化关系的研究,亦纳入本套文库之主题。

这套文库从2000年7月开始筹划,计划出版40~50种。为了确保文库的学术权威性,我们聘请若干名专家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负责审查鉴定申请资助的书稿。有关具体的申请事宜,可向“深见东州中日文化研究出版基金”运营委员会索取资料。

我们感谢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Culture)会长深见东州先生慷慨解囊,为本文库设立出版基金。深见东州先生本名半田晴久,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著名的国际慈善家、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深见先生酷爱中国文化,从他的数十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学和佛学均有相当造诣。

1988年,我应邀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从事遣唐使研究,经畏友梅田善美先生介绍与深见先生相识,此后在学术会议上多次见面晤谈。当他得知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日本文化研究著作因经费等原因而无法出版时,主动提出设立基金以光学术。对他的这种“中国情结”和对学术研究的理解,我们除了表示感谢和敬意之外,唯有把这项事业做好,以不负国际友人的初衷和国内学者的厚望。

上海古籍出版社毅然接受这套文库的出版;副总编张晓敏先生亲自参与策划,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2001年5月佳日

前 言

我国的文学史研究,包括中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研究,经过20世纪近百年的积累,已经有了相当扎实的基础,取得了不少成果,各种中国文学史以及由中国人撰写的各种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及国别文学史著作与教材,已达上百种。但是毋庸讳言,除了少量成果外,角度较为单一,作家作品的传记式研究、教科书式的陈陈相因的文学史,占了大多数。同样地,日本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日本已出版各种各样的《日本文学史》类的著作数以千计,比中国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还要多。但是除了少量著作外,在层面角度、结构体系、观点资料上多是大同小异,带有明显的滞定性与模式化的特征。

文学史研究要进一步推进与深化,就必须从通史、断代史、作家评传等单一化、模式化的研究中寻求突破,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发掘和呈现文学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某些侧面,以各种专题文学史的形式,呈现文学史原有的生动性与复杂性。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引入和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对此,笔者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一书及有关文章中,曾提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将各国文学中涉及到“外国”的作品,包括以外国为舞台背景,以外国人为描写对象,或以外国问题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归为“涉外文学”的范畴,并认为“外国题材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国题材外国文学史”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研

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主张从比较文学的“涉外文学”的角度,从域外题材切入,更新文学史研究的视角。^①就中国学者来说,要在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研究上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必须强化中国人独特的学术个性,必须发挥中国学者独特的优势,必须利用我们得天独厚的、外国人不可取代的条件进行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其中,研究涉及中国的外国文学,即研究中国题材的外国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本书所研究的“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就是上述理论主张的一个具体实践。

在这里,“题材”这一概念不同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所提出的“形象学”中的所谓“形象”;所谓“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也不同于“日本文学史上的中国形象”。“题材”当然可以涵盖“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异国形象及异国想像,但同时它又不局限于异国形象及异国想像。它包括了异国人物形象,也包括了异国背景、异国舞台、异国主题等;它包括了“想像”性的虚构文学、纯文学,也包括了有文学价值的非纯文学——写实性、纪实性的游记、报道、评论杂文等等。另一方面,文学的题材史的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一种途径与方法,又不是一种纯文学的研究。因为题材不是纯形式问题,它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对题材的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而对中国题材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中日双边文化交流关系史的研究,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

所谓“中国题材”,从日本文学史角度看,就是一种“外国题材”。采用异国、异族的题材进行创作,这在世界古今文学史上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在欧洲文学中,古罗马作家从古希腊取材,近代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丹麦取材,现代美国作家海明威从西班牙取材,现代英国作家吉卜林从印度取材,当代英国作家格雷厄姆·

格林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取材;在东方文学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从印度、波斯取材,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学从中国大量取材……这些都构成了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然而,和世界各国文学史上的“外国题材”比较而言,日本文学史上的“中国题材”,却具有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

日本文学对中国题材的大量撷取、借用和吸收,根据其需要,其途径、方式与处理方法也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日本人是在两个层面上摄取和运用中国题材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题材的直接、较为完整的运用。在这个层面上,作品的舞台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都明确表明为中国。这类作品主要存在于明治维新后直至今日的日本文学创作中,在日本古代文学如汉诗、谣曲、故事文学中也有少量相关作品。第二个层面,就是对中国题材加以改造,将中国题材的某些诗歌意象、情节要素、故事原型、人物类型糅入日本文学当中,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翻案”(亦即“翻改”)。“翻案”后的中国题材,不再有“中国”的外在标记,须经后世的研究者加以考证与研究之后,才能搞清它们与中国题材的渊源关系。日本古代文学中的中国题材大多表现为这种形态。如公元8世纪成书的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第一部物语《竹取物语》,物语文学的代表作《源氏物语》等,都有利用中国题材的蛛丝马迹。日本江户时代的“读本小说”,大量翻改《水浒传》、《剪灯新话》、“三言两拍”、《聊斋志异》等中国明清小说,如此等等。中国题材在这些日本作品中已经不具备原有的完整形态,而是被吸收到日本题材之中了。如果说第一个层面的作品对中国题材的处理方式是“易地移植”,那么第二个层面的作品则是把中国的枝条嫁接到日本树木上的“移花接木”。“移花接木”是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及中国题材深度消化的结果,已经不再属于严格意义

上的“中国题材”。因而,本书所谓的“中国题材日本文学”,指的就是第一个层面上的作品,即相对完整的中国题材在日本的“易地移植”的历史过程及种种情形。

中国题材在日本“易地移植”的历史,是与整个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相伴随的。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已经有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没有中断,至今仍繁盛不衰。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独自历史传统的文化和文学大国,像日本这样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特定国家(中国)撷取题材。从世界文学史上看,从异国异域撷取题材,往往是为了猎取外国风情,满足作家及读者的“异国想像”。就中国题材而言,近代欧洲各国(例如法国、德国、英国)的有关作家也曾经从中国古典中取材,也描写过现实的中国,但基本上不出猎奇和想像的范畴。与之相比,日本文学从中国取材,远远不只是为了满足异国猎奇与异域想像,而是出于更深刻的动机与内在需要。在古代,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发展程度上存在较大的落差,日本文人作家对中国文化怀有景仰之情,中国题材既是日本文学不可或缺的营养与资源,也是汲取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环节。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日本文人要引进中国文化,就要学习汉语,要学习汉语,就要学会写作汉诗汉文,而要摹仿和写作汉诗汉文,就要熟悉汉诗汉文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和人文地理,而一旦对中国历史文化典故与人文地理有所熟悉,就会在汉诗汉文的创作中使用中国题材。反过来说,不使用中国题材,日本人就学不来本色地道的中国文学;而学不来本色地道的中国文学,襁褓中的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就缺乏足够的营养来源。中国题材对于日本汉诗汉文这样的“外来”文体是重要的,对于“说话”、“物语”这样的日本文体也同样重要。在12世纪短篇故事总集《今昔物语集》的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三部分中,不仅“震

旦”部分十卷共一百八十多个故事全部取材于中国,就是“天竺”部分的五卷并非直接从印度取材,而是间接从中国汉译佛经、中国佛教类书中取材。其余日本部分的许多佛教故事有许多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不久之后,则出现了《唐物语》那样专门的中国题材的短篇物语集。14世纪成熟的日本古典戏曲“能乐”所流传下来的现存二百四十种能乐剧本(谣曲),从中国取材的就有二十几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尽管只有十分之一,但从题材来源上看,除了十分之九的日本题材,就是十分之一的中国题材。换言之,谣曲中所有的外来题材都是中国的。

经过上千年的吸收、消化与改造,中国题材在日本古代文学中大都被“移花接木”、纳入日本文学肌体中了,因而,严格意义上的易地移植的中国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题材日本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传统文学不同,日本近代文学不再以中国为师,而是追慕和学习西方文学。照理说在这种大语境下中国题材应该从日本文学中淡出,但事实恰恰相反,近现代日本文学对中国题材的摄取,比传统文学更广泛、更全面,从事中国题材创作的作家更多,中国题材的作品更丰富多彩。中国题材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古代文学缺乏中国现实题材的局面,中国现实题材开始大规模进入日本作家的视野,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的齐头并进、双管齐下,中国题材的创作在日本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更为引人注目。

先说中国历史题材。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习和摄取西方文化为主潮的时代,但江户时代随着儒学的正统化而繁荣起来的汉学传统,维新后仍在延续,作家们除了创作汉诗汉文外,还利用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及古代历史文化的修养,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

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中日关系的变化和西洋式新文体的普及,古典文学中对中国题材“移花接木”的方式基本不存在了,但对中国历史题材的“易地移植”更为普遍。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创作不仅将古代日本文学的中国题材在近代文学中承续下来,而且尝试着将中国古代历史题材移植于、运用于近代新的文体样式中,森鸥外、幸田露伴、中岛敦的小说、土井晚翠的新诗、长与善郎、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的新剧(话剧),都使古老的中国历史题材在近代新文学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即使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时期,在侵华文学、对华殖民文学独霸文坛的同时,也有中岛敦、吉川英治、武田泰淳等写了一些与侵华战争相对疏离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战后初期,武田泰淳、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承前启后,开启了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新时代。此后的海音寺潮五郎、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等作家创作的中国历史小说,融入了当代日本文学的主流。1980~1990年代,不仅陈舜臣等老一辈作家势头不减,更有伴野朗、宫城谷昌光、塚本青史、田中芳树等新一代作家的陆续登场,将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在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日本作家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体现出了某些基本一致的倾向,那就是褒扬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并喜欢从事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创作的人,基本上都是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至少是重视中日关系的人士。他们在作品中普遍表现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景仰之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所抱有的善意的理解和尊重。弘扬中国文化,将中国历史人物英雄化,成为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普遍的价值取向。即使是写中国历史上一些有负面评价的、有争议的人物,他们也从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不对历史人物作过多的道德评价,甚至站在肯定的角度上作出相反的评价。例如,在宫城谷昌光的笔下,淫荡的夏姬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善良的女人,原百代的《武则天》则站在现代女性主义的立

场上,努力描写出作为一个明君圣主、一个伟大女性的武则天的形象,扭转了长期以来站在男权主义角度对武则天的荒淫残忍的定性。再如,从《汉书》开始,史家们均站在维护王朝正统性的立场上,视王莽为谋反者和篡逆者,而给予否定的评价。塚本青史在以王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王莽》中,却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王莽。在他笔下,王莽是一个少有大志、刻苦读书、笃信孔孟学说、富有责任感、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其改朝换代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支持。而浅田次郎在《苍穹之昴》中,甚至对晚清的慈禧太后、李鸿章,都从另外的视角予以正面的描写和评价。

近代以降,在中国历史题材繁荣的同时,日本文学中的中国现实题材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题材类别上看,可以把中国现实题材的日本文学分为纪行文学、战争文学、通俗文学三大类。

纪行文学是近现代中国题材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近代之后这类作品的迅猛增加,与日本人大量踏入中国密切相关。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很有限,属于中国现实题材的只有一部分中国纪游诗与交往唱和的诗篇,而到了明治维新前夕,德川幕府拒绝与外国来往的锁国政策有所松动,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涉早于日本,因此日本人要了解中国,并要通过中国了解西方,来中国旅行观察最为便捷。明治时代最早进入中国并对近代中国情况加以报道、对中国人有所描写的,除了途经上海、香港到欧洲的留洋学生、政界与商界人士外,主要是当时的一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随军记者,然后就是一批作家。粗略统计起来,从明治维新后到1937年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前的近70年间,来华旅行过的著名文学家就有50多人。他们来中国旅行后,大都有纪行性的作品发表或刊行。此外,还有一些汉学家及中国问题研究家的中国见闻录或中国纪行类的作品也有文

学价值。这些人的纪行文学、中国见闻录、中国考察记等名目的作品,数量庞大,近年来日本有学者对这些作品加以整理筛选,以丛书的形式予以出版,但所选作品仍是冰山一角。这些人来中国的动机与目的各不相同,有的身负使命来中国工作或考察,有的是来中国寻求创作的题材与灵感,有的是来中国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不同的作家对中国的观察与评论的角度有所不同,都以自己的目之所及、足之所至,一定程度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状况,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一定的文学性。总的来看,他们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评价,却对现实的中国社会感到失望,对现实的中国人表示不屑乃至蔑视。到了侵华战争期间,中国纪行的写作主体主要是从军记者和作家,本质上属于“从军记”,是战时中国纪行文学的畸形状态,又可以归为侵华文学或战争文学。战后,从1957年开始,陆续有日本作家代表团应中国方面的邀请来华访问旅行,到1960年代中期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之前,曾有五个日本作家代表团陆续应邀来华。“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1980~1990年代,来中国旅行的作家更多。在这些中国纪行文学中,有的多角度地描写了战后中国的变化,反映了日本作家中国观的变迁,有的回顾战争中在中国的见闻经历,对侵华战争做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例如“战后派”作家堀田善卫的中篇小说《时间》是日本战后文学中最早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他的散文集《在上海》,回忆并描写了战时他在上海一年零九个月的体验,也描写了战后访问新中国的所见所闻。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前曾先后三次参与日本作家代表团访华的龟井胜一郎,抱着虚心与忏悔的心情写下了长篇纪行文学《中国之旅》,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的安定和奋进局面,也如实地表达了对当时的一些事物(如“人民公社”)不能理解、不可思议的心情。“文化大革命”运动

时期,武田泰淳、加藤周一、池田大作、曾野绫子、司马辽太郎等陆续应邀访华,在他们的中国纪行中,记述了对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种种观感、各自表达了赞叹、好奇、困惑、不解、冷漠等种种不同的感情。历时十年的“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小说家城山三郎和有吉佐和子率先来中国,目睹并记录了转型时期中国的变化。1980年代,中日两国的关系迎来了历史上的最佳状态,在胡耀邦和中曾根康弘主政的时代,在双方政府的安排下,甚至出现了一次就有三千名日本青年一同访华的壮举。日本作家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变得更容易,来往也更多了,中国纪行文学也更为普泛化。其中,陈舜臣、水上勉、东山魁夷等老一辈作家、艺术家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后写下优美的中国纪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近现代中日关系的第一关键词是侵华战争。与侵华战争相关的“战争文学”也成为中国题材日本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日本政府与军方历来重视战争宣传,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有日本作家从军,到中国前线采访报道。因此日本近代的所谓“战争文学”一开始就与侵华战争联系在了一起。随后的庚子事变、日俄战争,都有大批从军记者和作家来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全面实施,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和绝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积极“协力”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的“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其中有石川达三、火野葦平、上田广等作家,以中国前线或沦陷区为背景,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侵华日军和抗日或附日的中国人形象,还有一些作家,如佐藤春夫、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人,以中国为舞台,以中国人为主人公,写下了宣传与图解“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品,构成了战争时期中

国题材日本文学中军国政府御用文学的特殊一页。战后,一些战时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开始写作以战时中国为背景的带有回顾与反省色彩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追忆战时的中国体验,或揭露、反省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或描写战争、日中关系对个人及家庭命运的翻弄。其中重要的有作家鹿地亘的长篇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十年》,描写了日本侵华时期他秘密来华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十年经历,生动地回忆了他所接触的许多中国政界与文化界的人士,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描写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及中国人。战时居住上海的女作家林京子陆续发表的以上海体验为题材的小说,站在日常生活的角度,以一个少女的视角,反映了1932年上海事变、特别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租界的社会生活场景,描写当时居住上海的日本人与周围中国人之间如何相处和交往,在上海的各色日本人的行为活动、日本军队在全面占领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及中国人秘密的抗日斗争,等等。而另一位作家中园英助则将战时体验的舞台置于北京,怀着留恋的心情写下了《“何日君再来”物语》、《在北京饭店旧楼》、《我的北京留恋记》、《北京的贝壳》等几部作品,描述了他日本占领下的北京与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的交往。还有一些并没有战时中国生活体验的作家所创作的小说,如南里征典的《未完的对局》和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等,均以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以中日交流、中日关系为题材,不仅描写战争给中日两国带来的苦难、战时中日两国普通国民的爱与恨的复杂纠葛,也表现战后两国人民为走出梦魇而做出的艰苦努力。同时,还有的作家依靠在中日两国的客观的调查采访,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其中尤以本多胜一揭露南京大屠杀、森村诚一揭露“七三一”细菌部队骇人内幕的报告文学最有影响。这些作品怀着忏悔和同情描写了受害受难的中国人,代表了日本作家的良知,表明了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不让侵略战争重

演的善良愿望,在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在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史上,也是难得的篇章。

进入20世纪后期,日本的中国题材的文学创作也出现在大众通俗文学领域。包括推理小说、战争打斗小说、犯罪小说、冒险小说等。这些通俗作家大都喜欢将作品的舞台背景置于香港和上海。他们一般对中国并不很熟悉,之所以将中国的香港和上海作为背景,或许主要是为了强化异域色彩和国际感觉。有些作品以中国的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为背景,驰骋想像,具有猎奇意味。还有的作品其舞台背景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描写的则是华人华侨。其中的典型作品是作家驰星周的长篇犯罪小说《不夜城》,该小说描写了中国人黑社会在日本东京的红灯区歌舞伎町横行霸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行径。在他笔下,日本新宿的歌舞伎简直已不是日本领土,而成了中国人犯罪者的乐园,极大地败坏了在日华人的形象,也使日本许多人加深了对来日华人的偏见与歧视。在通俗的战争小说、未来小说中,有以过去的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的,更有以设想中的未来中日战争为题材的。例如森詠、大石英司等人的小说。这些战争小说大都以中国为实敌或假想敌,露骨地表现了对中国的厌恶和敌意,也重塑了人们所熟悉的好战的日本形象。将日本写成进步、正义的代表,又十分阴暗地将中国视为僵化、危险、霸道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那种不加掩饰的自由民主的“大日本”的自豪感,与不加掩饰的对中国的歧视、蔑视,折射出当代右翼势力的仇华反华心理。

综观世界文学史,在漫长的文学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地从一个特定的外国——中国——撷取题材,并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传统的国家,惟有日本而已。就中国题材的重要性而言,朝鲜传统文学几可与日本文学相若,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近代之后朝鲜文学的中国题材已经萎缩,不成规